

【历史研究】

抗战期间中英政府交涉中印公路 运输线考释(下)

张永攀¹, 杨 靖²

(1. 西北大学 西北历史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69; 2. 长安大学 建工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抗战期间, 中国政府出于物资援助需求, 筹划了中印公路日玛线和印藏驮运线。然而, 由于英国政府对之变化不定的政策以及对西藏噶厦的唆使, 致使该计划失败。中国政府在抗战中蒙受了巨大损失。首次利用英国印度事务部原始档案材料对此进行了详细研究, 并探讨了原因。

关键词:英国; 国民政府; 西藏噶厦; 中印公路

中图分类号: K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248(2003)03-0042-06

Research on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Authorities of Chinese and British with the Road of China-India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ZHANG Yong-pan¹, YANG Jun²

(1. Institution of Northwestern History Research,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2. School of Architecture Engineering,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For needs of military aids, Chinese government planned the highway and camel-way of China-India via Tibet in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However, because of the changeable policies of British authority and abetment from U. K to Tibet, this plan was aborted. For this reason, Chinese government had a great loss. This paper wants to research it in details by using the data from IOR in order to find the causes.

Key words: U. K; China public government; Tibet kashag; highway of China-India

三、中英对中印驿运线筹划的交涉

英国在唆使西藏噶厦抵制中印公路修建后不久, 还极力唆使、协助西藏噶厦对中国从印度运往内地抗日前线的物资进行阻挠。此举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物资补给。

抗战爆发后, 国际援助物资亟待运往中国内地。但由于中印公路修建一事的拖延, 国民政府直至1940年7月15日才召开驿运大会。同年9月, 交通部成立“驿运总管理处”, 交通部常务次长龚学遂提出, 驿运管理处应筹划三条运输线路。其一为康藏线, 联结中印交通。此线取道印度之锡金, 入藏进亚东、江孜、拉萨、太昭、昌都、甘孜至康定, 路程较

短, 治安较稳, 时间较省, 运费较廉, 但因政治关系, 此线未能开通。其二为新印线, 起自印度北部之司令纳加(Srinagar, 今译为斯列纳加), 经过列城(Leh), 抵达新疆叶城。其三为滇印线, 起自印度东北隅萨地亚(Sadiya), 抵达云南丽江, 此路“已组勘察队, 因政治关系, 迄未进行”^[1]。

对于这条路线, 西藏地方政府中也有人曾建议过, 《YUNG PAO》的作者丹增(Tientsin)曾说: “由拉萨到西康的保安和康安再抵达四川的重庆, 这条路线也称为西藏官道, 从地理上讲, 这条路非常崎岖与困难。然而, 当云南铁路被炸毁后及别的通往外地路线被阻塞后, 这条路也许随着援助蒋介石工作的发展而成为重要路线”。“西藏官道由一系列最困

收稿日期: 2003-01-06

作者简介: 张永攀(1975-), 男, 陕西榆林人,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博士, 主要从事近代西藏与英国关系研究。

难的路段组成。从拉萨到康定为1600 km。从拉萨到大吉岭通过喜马拉雅山是600 km。英国人计划的第一步是从大吉岭修火车到江孜,今后再把它延伸到拉萨,而中国方面则应该计划修建从康定到拉萨的铁路”,丹增的设想在当时无异于梦想而已,英国从大吉岭修建火车到江孜的真正目的可不是为了仅仅援助抗战中的中国。

1942年8月中国国民政府同意商讨开辟一条新的中印“驮运补给线”,以运送“非军事物资”。这条拟议中的运输线为:起自印度经甲拉山口(Gy-alam),贯穿西藏中部、东北(不经拉萨),至青海的玉树或玉树南的巴塘(Batang),这基本与龚学遂所提康藏线所符。虽然此线一年之内通行时间只有四个多月,路程较长(仅拉萨至玉树的古驿道就为1135 km,共38站),往返一次费时六个月之久,且其年运输量可能小至4000 t,但苦于物资匮乏的国民政府,在困境中仍对这条运输线充满了希望。

英印政府最初对中印畜力驿运线给予支持态度,均认为:“尽管在物资供应方面的实际结果是很微弱的,甚至与我们的对藏政策相违,但我们必须去做”。早在1942年3月初,由于缅甸局势的恶化,英印官员绕伊多巴于18日赴拉萨和噶厦进行关于驿运的密谈。绕伊多巴自称负印度总督和锡金国王的命令,考虑到中国长期抗日必须依靠英国运输军火,而目前滇缅路断,英国将取道噶伦堡、帕里、江孜拉萨,然而经过西康运送军火以援华抗日,所以请西藏噶厦给予骡马协助承运。尽管中国政府愿意开通经过拉萨的驿运,但其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中印公路上,所以中国并未与英国在拉萨驿运方面商谈过任何事宜。然而,绕伊多巴却希望中国放弃修建中印公路北线的希望,而将希望寄托于驿运上。所以绕伊多巴讹称中国政府已经与英国政府商谈好拉萨驿运事宜,希望噶厦早日同意。噶厦对此事颇为重视,22日噶厦召开民众大会后认为:“先前战况为英败印危,英国企图将西藏作为根据地,而因骡马运输有限,英国必然将修筑通过拉萨的公路。先前中央政府拟修筑康印公路,仅经过西康边界,但英国人态度反复,而噶厦占卜也不利,所以就决绝了中央。现在英国又口称援华,似乎前后态度很矛盾。而开通驿运其严重性远胜于康印公路,所以噶厦坚决予以拒绝。”

国民政府得知消息后,深知英国的目的在于“不愿我经营康藏之心”。同时对于“印员讹称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已有商洽”之事,表明“中英双方事前并

无接洽”,斥责了英国官员“以欺藏人,欺中国疆吏”的做法。但对于英国支持开通印驿运的态度却颇为满意。

1942年4月,英印军队总司令也表示赞同畜力线的开通。1942年,在拉萨掌管英国代表团的诺布顿珠依照英国的指示向西藏噶厦询问:西藏是否允许国民政府开通中印畜力驿运线。噶厦以“如果军用物资通过西藏,则其他势力也会照例行之”的理由加以拒绝。于是,英国驻西藏代表卢劳(Frank Ludlow)向西藏噶厦劝说同意开辟另一条中印驿运线,即起自锡金,通过拉萨、昌都至巴塘和打箭炉这一传统的康藏商贸道路,卢劳的建议仍为西藏噶厦所拒绝。由此看来,国民政府所拟定的中印畜力驿运线难以开通。

1942年开始,英印政府不断向噶厦施加压力,希望与西藏噶厦进行协商。同年3月英国通过援华军火的名义,取道噶伦堡、帕里、江孜、拉萨,希望西藏能骡马协助运输,但得到西藏噶厦的拒绝。同年6月19日,交通部长张嘉璈与英国军事代表布卢斯谈到西藏问题,布卢斯认为中英双方会同通知西藏:在保证不干涉西藏拉萨至巴安一带现有状况下,请西藏开放驿运线。同年7月2日国民政府继续讨论驿运问题,该会上蒙藏委员会报告:英国驻西藏代表已与藏方谈妥驿运,一旦国民政府决定路线、运量及货物种类,即可开通。但未久,英国又告知中国政府,西藏仍然拒绝开通驿运线。该年6月,卢劳在英印政府的指示下,对西藏噶厦说:如果西藏仍然拒绝驿运,英国就可能撤消其对西藏的“自治权”的承认,或者阻止汉地砖茶运销西藏,甚至对西藏的羊毛出口进行阻挠。英印政府也表明:“印度政府目的在于建立一条物资运输路线,而作出合适的安排,以有利于盟国‘自由中国政府’抗击日本,除此而外并无其他目的。为此,他们已经开始着手同西藏政府协商,在协商过程中,藏政府提出了准许货物从西藏通过运往中国的条款和条件,印度政府接受了这些条件并得到西藏方面的赞成,现在已提出中华民国交通部公路运输管理局和西藏运输贸易机构应当进行直接磋商,印度政府已考虑腾出最好的场所以利于在藏政府所提出的条款的基础上签订这样一项协议。”在英印的压力下,1942年7月,西藏噶厦终于作出让步,提出驿运线只能“运输药品、邮件和民运物资”的开通条件,并且就之与英国和中央政府进行了协商,中印驿运终于开通。当时西藏噶厦虽然禁止“军事”物资从西藏过境运往内地,但对于军用汽

油却并未加以封锁,中印驿运的估计运输量为 3 000 t(如果全部来运输汽油,则为 750 000 gal),国民政府期望通过驿运线来解决战时的石油匮乏问题。

然而,英国在出卖中国权益的二战绥靖政策下,并不会诚意帮助中国政府。早在 1942 年夏,英国外交部命令驻华大使薛穆就中印驿运事宜向中国政府交涉,玩开了两面手法。该电说:“西藏进一步通过印度明确表示拒绝援助物资过境运往中国,理由是它希望置身于战争之外”。英国政府拟采取的对策是:“如果有必要,经过与中国政府联系,准备直截了当地威胁西藏将对它进行经济制裁,以使西藏改变态度”。但是,英国政府却附加了一个进行经济制裁的前提:“由于据信西藏之所以不愿意在很大程度上是担心中国的渗透,因此中国应当首先做他们这方面应当做的,以利于西藏接受”。什么是中国应当首先做的呢?电文接着说:

“中国政府应公开明确地表示承担起尊重西藏自治及不干涉西藏内政的责任;如果中国政府这样做,英国政府准备与他们联合共同施加压力……英国政府在中国与西藏的问题上所要求的一点也不比中国人在英国与印度的问题上强烈要求的多,这就是自由与自愿地加入到共同反对侵略的合作中来。”

英国在此把印度问题和西藏问题相提并论,其用意非常明显:首先,英国警告中国政府最好放弃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二是压迫中国承认《西姆拉条约》中规定的名为自治实为独立的西藏地位。

实际上,英国担心这条畜力驿运线的发展会影响到西藏的“自治地位”,于是唆使噶厦对驿运线进行阻挠,要求中国政府只“运输药品、邮件和民运物资”,甚至协助西藏噶厦关闭这条畜力运输线。同时,英国又劝说西藏噶厦“同意货物经过西藏”为条件,要求国民政府公开申明尊重西藏的自制权。英印政府对中印驿运的支持态度也是与卡罗主义的侵略本性相违背的,英印政府在中印驿运一事中的斡旋必然有其目的。1942 年中期,英国便开始要求中国发布“尊重西藏自治的申明”,中国政府当然对英国的无理要求给予拒绝。国民政府表态:不可能发表一个尊重西藏自制地位的公开宣言,但也不会干涉西藏噶厦的内部自治管理。同年 8 月新任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信中表达了英国的处境:“我们希望汉藏运输问题应该用公平合理的方法去解决,但是一些基本的障碍仍存在。尽管中国人在观点上未达成一致局面,他们依靠对西藏仍有效的宗主权对其采取措施。

我们毫不费力便可推断西藏当局允许少量物资通过他们所控制的领地。中国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未接受由于我们与拉萨政府调停所带来的利益。”由此看,到 1942 年底,国民政府在“西藏自治的申明”一事上未屈服于英国。于是,英国伺机在驿运线再作手脚。1942 年 8 月,中央政府要求与西藏噶厦磋商运输线的具体贸易事宜,西藏噶厦则要求与中央政府签署一份由英国签字的三边协定,否则不再允许货物经过西藏。英国借机拒绝在这个三边协定上签字。西藏噶厦也得知英国的意图后,于 1942 年底下令关闭中印驿运线。

西藏噶厦的这个突然举措,给正在艰苦地进行抗日战争的中国军队带来了严重物资匮乏的后果,更多的是对抗战中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心理上的副作用。正如英印政府外长卡罗所说“此路虽运输量有限,然对国内心理之影响则甚大”。同时,而印度政府又对中国商人所申请的出口证均加以拒签,致使抗战期间的国内经济也遭受一定损失。英印对此的藉口为“如允许商人出口,中国政府物资将更无法运出矣”,中国政府深谙英印的目的是在于控制中印运输线,“事实上我国官民两方对此路均未能利用此或”,“为英方之狡计,表面上赞同而暗中仍挑拨藏方作梗”。

四、国民政府以军事手段解决驿运线问题

由于中印公路日玛线被西藏噶厦所阻挡,中印“利多——赫兹堡公路”也未开通,此时中印驿运又被西藏噶厦所关闭,严重影响了中国政府的抗战。国民政府终于欲对西藏噶厦进行军事行动,以解决自民国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控制的松散局面。据蒋介石高级幕僚唐纵日记记载:“西藏用兵计划草案已奉批下,在明年开始行动,预定于明年十月前,进驻昌都,再用政治方法解决西藏问题。”^[2]

早在 1942 年国民政府内部便提出要以军事手段解决西藏问题。例如 1942 年 6 月,白崇禧告知张嘉璈,不日将前往青海,商谈由青海派兵至西藏北境,压迫西藏先开空运,同时策划驿运。但同年 10 月 15 日白崇禧又告知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与交通部张嘉璈,“似此兵力压迫西藏就范之计划,已无希望。”^[3]遂由此作罢。当时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负责人孔庆也宗在 1942 年 8 月 29 日就致电蒙藏委员会,指出:“中央对藏向有主属关系,不比外国……院议办法两项,如第一项办不到,则以后难关重

重,藏焰日高。钧座对噶厦电似应严予驳责,坚持原议。……钧座再电噶厦时,似宜酌施压力,以助交涉,并窥西藏真意。酌拟二法:一、派飞机赴昌都一带侦察,借词习飞山地,通知藏方不得开枪,以免自卫投弹;同时令青、康、滇军越境,为地方性之煽动。二、密令青、康、滇军以地方冲突形式一举攻占昌都,扼守待命,以留中央转圜余地。查假道运物,英以断绝商务迫藏而得结果,今大敌迫近,印度、西藏为我国军事交通要区,后事日多,长任作梗,终无了局。”^[4]但是,国民政府仍然希望以和平手段解决之,并不希望轻易动武。蒋介石于同年8月26日乘机巡视青藏边地区,决定“对藏暂时隐忍,以冀其自觉”,认为解决西藏问题要以政治手段为主,军事手段为辅。

国民政府仍然把解决印藏驮运线事件及西藏问题寄托于英国,在二战中后期世界各地民族主义运动如火如荼的时刻,中国也希望借此机会废除中英间不平等条约,顺便解决西藏问题,要求英国势力撤出西藏,使噶厦失去其靠山。1942年10月31日蒙藏委员会致电外交部:“中英历次所有关西藏条约俱违平等互惠精神,目前英国在藏南江孜、亚东等地驻有军队及商务专员并敷设邮政局、电报局、旅舍以及享有进出口货物之免税等事均系特权性质”,蒙藏委员会建议外交部在谈判时注意:“1. 西藏为中国领土,中国应有在藏行使主权之自由,英人须予尊重;2. 有关藏案之中英不平等条约及西藏与英印方面直接订立之任何条约及协定一律废止,本平等互惠原则另行商议新约;3. 西藏问题应与有关英国在华特权之其他各案合并讨论,不得除外。”1942年1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拟定了《西藏之政治制度及其对于中国之关系》呈给蒋介石过目,该文件指出:“中国一向认西藏为本国领土之一部分,对西藏有主权。康乾盛世,对西藏曾积极统治。民国以来,屡欲恢复前清强盛时代与西藏之关系。只因国力不充,处境困难,未能贯彻。”关于中央对西藏应采取的方针,该文件认为:“中央对西藏不外采取两种可能之关系:甲、恢复藩属之地位(准备兵力,行使统治权);乙、中央给予西藏以自治权,除国防、外交及一部分交通、经济、财政与教育由中央主持外,余皆允许其高度自治。”文件建议中央政府“似宜采取乙种关系较为切合西藏环境,适应世界潮流”。文件认为“惟欲恢复中央在藏之主权,必先竖立中央在藏之威信”,采取“重实不重名”、“划分步骤,不求急进”等方法,以实现西藏问题得到解决。

1943年春,蒋介石又决定派兵入藏。由于多种原因,云南和西康的军队实际没有采取行动。青海马步芳在得到国民政府的马枪200支、轻机枪50挺、子弹数万发和军费后,调集数千军队开赴青藏边界。同年5月,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告知张嘉璈“青海有三千马队入藏境后,藏方来电要求政府勿再增遣部队。蒋介石召集西藏驻京办事处主任阿旺坚赞等人,阿旺坚赞首先表示希望中央停止对西藏的军事行动。蒋介石告表示中央的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日寇勾结西藏,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修筑中印驿运。同时蒋介石指出噶厦对中央的不友好态度:1. 藏方阻挠交通。2. 勾结日本。3. 设立外交局。4. 对待政府驻藏官员,不予礼貌。”最后,蒋介石要求西藏代表阿旺坚赞转告西藏噶厦“勿受英人诱惑”,并且协助修建中印公路、协助办理驿运;驻藏办事处向藏洽办事件必须与噶厦商量而不经外交局;中央人员进藏凡是持有蒙藏委员会护照者,需照例支应乌拉;在印度华侨必要时需经西藏撤出。

1943年3月西藏噶厦得知中央出兵的消息后,感觉事态严重,令噶厦官员马上向中央申辩:“因英国作梗,致使西藏拒绝(中印运输),得罪中央,故应向中央报告探明真相”^[2]。

然而,西藏噶厦在中央的军事压力下并未立即开通驿运线,反而转向英国求援:“驻扎在西宁的青海省主席马步芳直接而故意地违反了西藏与青海之间所订立地《条约》,调集数百名军队开进了那曲附近属于西藏领土的扎玛(dzamar)。据说今年侵略意图更大,许多军队已被调到了西藏边界,还有一些军队正在向西藏开进途中。自然,西藏政府不能再采取消极态度而必须最佳对策,设法维护我们的主权的完整。请求我们最大的盟友英国政府,通过印度政府给予我们尽可能的援助,以支持和维护我们的独立地位,并请求锡金政治专员特别助理谢里夫(G. Shemff)少校监督此事。”

英国对于中国政府欲出兵一事颇为感到意外,遂向中国政府询问详情。据唐纵日记记载:“英国大使向我外交[部]送到备忘录,谓西藏对我中央将向西藏用兵表示惊骇,希望我国否定其事。委座(按:蒋介石)闻之甚为不悦,嘱吴次长(国桢)将备忘录退回,西藏为我国内地,为何英国出面干涉?”^[2]从唐纵日记判断,英国与中国交换的官方备忘录并未透露出中国的军事行动。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给英外交部的电文中,也否定了中国的军事行动:“……中国外交部次长答称,他对军队之调遣未获任何消

息……引起我们注意的军队调动是在中国境内并由于内部原因而引起的,与我们无关”。1943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参议会”上,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也对英国首相丘吉尔说,尽管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央并无意对西藏进行战争。不久,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又向英国驻华大使口头保证,中国政府的军队不会对西藏有所动作^[5]。所以,英国政府在中国政府的一再保证下,认为国民政府并不会发兵西藏,西藏噶厦并没有必要向英国发出请求,以减轻“国民政府的军事压力”。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却悄悄开始了军事行动。1943年春,青海军阀马步芳在中央国民政府的命令下调集1000名士兵开赴玉树。该年5月12日,蒋介石再次召见西藏驻京办事处(时在重庆)的负责人阿旺坚赞,要求西藏保护中印驿运等五事:“……(一)协助修建中印公路;(二)协助办理(中印)驿运……若西藏能对此五事遵照办到,并愿对修路驿运负保护之责,中央军队当不前往,否则,中央只有自派军队完成之……”。此时,西藏噶厦未得到英国的明确态度,又遭到中央政府的责令,开始恐慌起来。

1943年4月8日,西藏摄政大扎活佛又会见了英印驻藏代表卢德劳(ludlow),问其是否收到了中国军队在西南、四川和西宁边界调动的官方报告,并请英印多家关注此事。

不久,西藏噶厦通过驻京办事处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了一封代电:“窃代表等前次晋谒委员长蒋,恭奉面谕五项,遵已转电噶厦在案。兹奉噶厦电开;来电所陈委座面谕五项。均已详悉,自应速即遵复,上纾眷虑。惟以西藏向例,关于重要事项,必须藏中僧俗官民同意,拟议俟询商后,再行奉答。仰该代表等先行转呈等因。除电陈委员长蒋外,谨电转陈,伏乞鉴核。”从这封电报我们可以看出,噶厦已有向中央妥协的意图,并且还欲将关闭驿运线的责任推向英国:“假道运输原系英方接洽,与中国无关,如经玉树运物,则道路破坏者,由西藏自修”^[5]。

1943年4月英国政府急于知道汉藏边界上的最新动态,但苦于无情报源。同年4月14日,英国外交部对其驻中国成都领事馆表示“没有手段获知汉藏边界上详细的情报”,但如果派人去调查“又有些鲁莽”,所以询问领事馆是否有新的情报。同时,他们希望成都领事馆通过曾赴西藏的美国托尔斯泰处获取第一手情报。此外,外交部还联络了英国驻华保险董事会的 Han li Wu(吴汉黎),进行了私人性的征询,因为“他经常和中国政府的高官们有密切

的联系”。令英国外交部遗憾的是,吴汉黎又重复了几个月前告诉英国的内容:“云南的行政长官决定用武力开通穿越西藏的运输线”,“中国政府对西藏并没有侵入的意图。最近的政策也是在边界地区保持非常安定”。

但是两周以后,英国驻重庆使馆发回了最新动态:“看起来也许蒋介石在两个月以前给西康的统治者刘文辉下达了命令,要求他的军队开进西藏,但刘文辉担心削弱自己的势力,于是拒绝如此做。蒋介石发布命令的原因据称要增强汉人对西藏的影响和在四川西部加强中央军的势力。美国官员最近从西宁返回,据说从马步芳的秘书那里知道了关于汉藏事务的消息,在两个月前,马步芳将军接到了蒋介石决定进发西藏的命令,马步芳将军声称已经在边界上聚集了一万名士兵。”这封信中还提到,据称日本准备给予西藏军火援助,并且在青藏高原修建空军基地。薛穆推测,这些消息是西藏人为了探测国民政府军队的行动方向而故意放出来的。

1943年4月27日,印度政府向英国报告了西藏的求助:“西藏所作出的让步无疑被汉人在边界上的军事动向所干扰。在1942年青海的东干领导人马步芳率领一大批东干军队(按:指回民)移防到库克诺尔(Kokonor)的西部,看起来这个离开甘肃的行动与中国的内政有关,西藏政府现在对我们抱怨数百人马步芳的部队从去年进入了西藏地面,而且已靠近了 Nagchuka,今年更多的军队靠近了西藏边境意图侵略,据报告说3千东干人,从西宁的南部向西藏进发。成都的迹象也表明两个月前马步芳和西康统治者刘文辉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将其军队往西部转移。尤其是马步芳借口西藏人攻击汉人,并且和日本人合作建立空军基地;西藏政府已经要求我们给予他们支援以维持他们的独立”。

但是,英国外交部还是不太确定中国军队是否已经真正开始行动了。1943年4月30日英国外交部给薛穆表示,英国对西藏的义务就是“给予其外交上方面的支持,以抵抗汉人军队的入侵”。“首先,我们应该正式地询问中国外交部长,目前的传言是否真实的。但是,这不应该把穿过西藏的那条驿运线事件与汉人军队运动事件联系起来”,外交部还指示薛穆,如果中国提起驿运的事情,他要拒绝对答中国的质询。如果中国声称“西藏准备进攻汉人而且和日本合作”,他要回答“大英政府不喜欢被这样的可笑故事所感动”。

对于西藏和日本人勾结的谣言,英国政府很是

关注。因为他非常担心受到美国政府的责问,为了保险起见,英国要求西藏噶厦作出书面保证。英国的这种关注不是没有原因的,早在日军侵占东北时,日本人就希望通过班禅将其势力扩展到西藏,但均未取得成功。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再次认识到西藏对于整个中亚的战略地位重要性,屡次派特务进入青海地区企图渗透到西藏,但由于马步芳的阻挡而未成。1943年,日本设立在中国的岩井特务调查班成员李洪偶然认识到西藏青年蒙那昌(Pama Tshewang),并将其收买。蒙那昌将西藏的情况用藏文写出后,由曾在拉萨寺院里学过经的佛学学者青木文教将之译为日文。所以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可能发现了该事,而出现以上的传言。

1943年5月,西藏噶厦向英国表示:“西藏是一个完全奉献给佛教的地域,我们严正地保卫我们的边界不受侵入,并且断然拒绝和任何其他的外国势力建立关系和往来。”英国政府对于西藏保证和日本没有勾结的宣言表示非常满意,并且通知克拉克转告美国政府:“西藏政府对于任何日本人在其区域内活动的否决是相当明确的”。但是,英国还是在另一个谣言上——即西藏准备入侵内地的传言感到了疑惑,因为西藏在这次申明中没有提到这一点“西藏人没有在申明中提到他们是否有侵略的意图,这一点值得重新要求他们答复”。但是古德并不这样认为,甚至为西藏噶厦很担忧。因为他认为目前西藏官员和摄政都很软弱,在与沈宗瀚的交涉中,过多地表现出怯懦,所以西藏根本不可能对中国内地所有军事行动。

1943年5月中旬,英国通过各种渠道,已经确知中国军队的动向。同年5月7日英国大使薛穆(Seymour)在重庆拜会了中国外交部次长吴国桢,称“据西藏当局告知驻藏代表,4月3日有中国骑兵700名抵达青海结古(玉树)以南之某地,又步兵200名到达离昌都约三日行程之某处,中国军队现在结古集中,已有3000步兵队由西宁开至青海南边,西藏当局深感不安。英国政府以为中国此时在中亚细亚有所举动,不甚相宜,希望中国政府能表示无此事实,以便转告西藏当局,使其安心”。吴国桢表示:“中英各自利益均需两国之关系日益增强,故据此立场向阁下能谅解余之言论。余希望阁下能撤回此项询问。余对于我国军队之调遣不甚明了,就余所知,阁下所述或竟毫无根据。然如果余将阁下提出之问题转达我政府及军事当局,余不知究将引起何种反响。一国之内部队之调遣,实与另一国无关,至于一

国之中央与地方接洽事件,无论其友国如何友好,亦无友国代为转达之必要。因余个人志愿使中英关系日益增强,故希望阁下不提此事。”^[4]同年5月15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根据英驻藏代表所报又特意向中国外交部质询,宋子文愤怒地反驳到,“一国之内部队之调动,实与另一国无关……故希望阁下不提此事”。

1943年5月21日,英国驻华使馆一等秘书巴克利·盖奇(Barkley Gage)在同中国外交部总务司长李惟果的谈话中又表示,在英国通过批准废除治外法权条约以确定要消除过去的误解之后,“如果因该问题而产生误解,使两国友好关系出现新障碍,这将是一个遗憾”。他还强调,英国关于西藏的迫切问题是保证中印驿运线的开通,而中国对西藏的军事行动只会使这条驿运线更加开通无望,且由于印藏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国对西藏的军事侵略将会使中英关系恶化。

蒋介石得知英国如此蛮横的态度时,指示吴国桢将薛穆送交的备忘录退回,表示:“西藏为中国领土,我国内政决不受让任何国家预问。英国如为希望增进中英友谊,则勿可再干涉我国西藏之事。如其不再提时,则我方亦可不提;如其再提此事,应请其勿遭干预我国内政之嫌,以保全中英友谊”。

1943年6月,在中央的军事压力下,西藏决定召开民众大会商讨公路及驿运事宜。会议决定,对于中印公路,“仍以神意反对测修”,但对于驿运,则表示让步:“假道运输原系英方接洽,与中国无关,如经玉树运物,则道路破坏者,由西藏自修”。噶厦还讨好般地对国民政府说:“西藏应与中央保持感情,不应与中央西藏办事处断绝关系。”^[4]该年下半年开始,西藏终于答应对中印驿运路线重新开放,该年6月,西藏噶厦致函英国:“……我们已经下令让噶厦驻亚东的商务代表,并且通知驻于噶伦堡的中国商人货物可以进藏”,但西藏噶厦也提出了具体条件:“中国必须担保无军需品与带着货物而企图进藏的外籍公民。”西藏噶厦还请求印度政府“通过其设在德里的外交部和锡金政府专员,留意不让汉人在没有事先得到西藏政府准许的情况下入藏,禁止任何军需品入藏,禁止任何军需品通过西藏边境,并请求锡金政府专员特别助理谢里夫监督此事。”

此后不久,噶厦就中印驿运线事件再次致电西藏驻京办事处,答应正式开放中印驿运线,并且保证“汉藏货物由印度途径西藏时,雇用驮畜,向无阻碍,

(下转第63页)

会、经济、法律、人权、环境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步伐将会大大加快。这是一个促进两性平等、为妇女争取保障权益的大好时机。此项调研从人文关怀出发,希望借助法律、媒体、政府各方力量,关注、理解、扶助、保护单亲母亲这一弱势贫困群体,进而加快在妇女维权方面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推进两性平等发展的进程。

参考文献:

- [1] 民政部财务和机关事务司. 2000 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0.
- [2] 民政部财务和机关事务司. 1999 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 [3] 民政部财务和机关事务司. 1998 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8.
- [4] 民政部财务和机关事务司. 1997 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7.

- [5] 2000 年世界统计年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1.
- [6] 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N]. 民政部中国妇女报, 2000-09-06.
- [7] 戴雪红. 失去目标的女权主义运动——平等与差异的两难困境初探[J]. 妇女研究论丛, 2002, (5).
- [8] 陈一筠. 现代婚姻与性科学[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 [9] 陈小江. 女人的出路[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9.
- [10] 刘家殷. 中国离婚问题回归分析[J]. 北京机械工业学院学报, 2000, 15(4).
- [11] 徐安琪. 中国离婚率地区性差异分析[J]. 人口研究, 2002, 26(4).

[责任编辑: 陈志和]

(上接第 47 页)

今后藏政亦一如既往, 随时给以帮助, ……不受盗匪抢掠……”^[4]。由此, 中印驿运线终于得以重开。此后, 中印驿运线在抗日战争中基本处于开通状态。虽然 1943 年英国宣布所有途径西藏运往中国内地的货物均要事先向英印政府申请出口许可证, 拒绝批准一切有关申请, 致使这条运输线又中断较为短暂的时间, 但是此后西藏噶厦再未封锁这条驿运线, 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结束。

1944 年沈宗濂入藏时, 受英印外交部部长卡罗的邀请进行会谈, 期间曾谈到中印运输问题, 卡罗表示英国“对于印华驿运以往曾尽力协助”, 并且通报了由印度至拉萨的每月运输量均为 200~400 t, 由拉萨至内地每年不过 1 500 t, 每月经仅百余吨。沈对此解释到“因受天时及牛马数量之限制无法大量增加”, 沈同时向卡罗表示了在印的待运物资, 花纱布管制局存有面纱约 2 000 t, 交通部的兵工器材也有相当数量待运, 复兴公司的生丝布纱也每月有 50 t。

在整个抗战时期, 只有少数西藏商人与英印商人利用这条驿运线将少量民运物资运到中国内地, 而中国政府的待运物资则很少能利用这条运输路

线。1941 年在日军侵缅前, 在印度大约有 120 000 t 的军用物资欲通过驿运线运往中国内地, 但由于中印驿运线时开时停, 实际运入量极小。1943 年早期大约只有 5 000 头骡子, 1944 年至 1945 年上半年大约也只有 8 000 头骡子与 20 000 头牦牛在这条驿运线上进行运输。据估计, 由于英国、西藏噶厦对中印公路日玛线和驿运线的阻挠, 中国在二战中将近损失 80% 的军事物资援助, 使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遭到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 [1] 龚学遂. 中国战时交通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47.
- [2] 唐 纵. 在蒋介石身边的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M].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1.
- [3] 姚松龄.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M].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2.
- [4] 多才杰旦. 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Z].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4.
- [5]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Z]. 北京: 三联书店, 1963.

[责任编辑: 杨彬智]